

的政治生活。但是,受法律规定限制,他们没有参加城市街道、社区的民主选举和事务管理的权利。由于权利表达渠道实际上的缺失,使得新生代农民工与他们的父辈一样,没有直接或间接表达其利益诉求的政治渠道,处于国家政治生活边缘的状态没有根本改观,维护自身其他基本权益的能力因此明显不足。农民工工资被拖欠、讨薪被殴打、恶劣行径至今屡见不鲜,是农民工维权困境最直接的表现。

依附于城乡二元制度的狭隘市民文化和不良文化氛围,更像一堵无形的高墙,将新生代农民工在实际上挡在城市之外。对于一些城市市民来说,农民工始终是素质低下、思想观念落后的“二等公民”,是来城市与他们争抢就业机会及各种社会资源的外来户。部分新闻媒体、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也表现出不同程度的误解、误读,从而形成城市社会排斥农民工的“思维定势”和社会文化氛围。这种对农民工的偏见、歧视和排斥以当面冷嘲热讽、肆意拖欠工资等多种形式表现在外,甚至一些城市管理者力图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改造城市边缘农民工租住房屋等方式,使农民工失去在城市的就业机会和栖身之所,逼迫他们离开。如上现象,造成新生代农民工普遍存在相对剥离感、社会差异感、社会距离感,使得他们在渴望扎根城市、融入城市的同时,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过客心理、对城市的冷漠感和疏离感,身份认同的困惑进一步加深。

当城乡二元制度和社会的固有偏见与歧视,如一堵无形的高墙将自己与城市主流社会无情隔开时,新生代农民工容易出现价值体系混乱和选择偏差。为继续扎根城市,他们在传统观念、现实利益需要等因素驱使下,往往会依靠血缘、地缘和人缘等传统关系建立自己的社会网络,以此支撑他们在城市的生活、生存。这样的传统社会网络会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新生代农民工解决诸如就业、子女入学等具体问题,使其扎根城市更具可能性。但同时也应看到,这种熟人社会的形成,实际上也将自己同城市的主流社会进一步隔绝开来,成为城市中的“孤岛”社会,与其融入城市的初衷渐行渐远。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由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所组成的城市中的“孤岛”,与其说是地理上的“城中村”概念,不如说是其心理上的“价值观”概念,极其鲜明地反映出新生代农民工在价值观上的困惑。他们的户籍身份是农民,但他们更认可自己实际从事的工人身份;他们来自农村,留恋乡土,但他们把实现自己价值的方向定在了城市,不甘心自己的未来是回家种地;他们在城市中工作生活,但工作、生活中的种种际遇,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他们农民的身份;他们以自己的汗水,为城市社会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却难有机会去享受自己劳动的果实。这种理想与现实的遥远距离,迫使新生代农民工从文化上共同组成了城市中的“孤岛”社会。而组成这一城市“孤岛”的,是一个个渴望在城市拥有未来、却时时彷徨迷惘于城市人

潮人海中的一叶“孤舟”。

当前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的困惑,折射着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社会转型的深刻而又剧烈的变迁。由于新生代农民工人数众多,且牵涉中国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社会体制等深化改革开放需要面对的一系列深层次问题,使得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的困惑实际上成为中国整个社会的困惑。当前,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已引起政府和社会各界高度重视,种种迹象表明,伴随着相关政策的调整、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社会文明的更大进步、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差距的不断缩小,守望在“孤岛”的新生代农民工会逐渐为城市社会所接受并成为城市社会平等的一员,进而形成推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巨大动力。同时,我们亦应注意,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在城市所形成的“孤岛”问题,如不及时予以有效解决,也有使城市社会分裂为主流社会与边缘社会的趋势和造成社会动荡的危险。可以说,能否有效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面向未来的困惑问题,检验着我国文明的程度,考验着管理者的能力与智慧,也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中国的未来。

## 农民工的身份焦虑:两种文明的冲突

□张泉,山东大学生活质量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

2005年,由张纪中制片、康洪雷导演的电视剧《民工》,讲述了鞠家父子两代人的打工经历,深刻而生动地刻画了他们迷茫、憧憬、痛苦、幸福、挣扎和无奈的心路历程。同时,该片也揭示了一种突出的社会现象:当代中国农民工的身份焦虑。



当代中国农民工的身份焦虑,就其本质而言,是古代农业文明和近代工业文明两种文明体在个人内心冲突的外显。农民工内心深处所经历的这种文明体之间的冲突,和鸦片战争后整个中国那种在迷茫中不知所措、艰苦寻索的情况在本质上同出一源;农民工心中两种文明力量的碰撞,和鸦片战争后洋务派和守旧派之间的激烈争辩也并无二致。

### 乡土中国与城市中国:并非仅仅两种文化

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是一部描述和剖析中国乡村社会的经典著作。它从诸多方面给中国乡村这种文明形态给予了精妙的描述。从情感上,农耕文明赋予了农民强烈的土地依恋,农民好像半身扎在土里。从沟通媒介上,乡土社会是一种“面对面社群”,不需要文字这种会失真的沟通媒介。从社会关系上,家族占据重要地位,家族成为担负生育、政治、经济、宗教、情感等功能的事业社

群。从人际关系上,农村基于以家族为中心的礼俗社会发展出独特的差序格局。从道德上,以人际关系的差序格局为基础的乡村文明又产生出从内向外延伸的孝悌、忠诚、慈善、责任观念。在社会秩序上,农村依靠基于敬畏传统而来的礼治来维系社会秩序,这种看似无为而治实际表现在对前辈长者的尊敬上。同时,农村社会是一个基于血缘和地缘而维系的文明体。

如果说费孝通细致精妙地剖析了以中国农村社会为代表的古代文明,那么滕尼斯则为我们理解现代城市文明为代表的近代社会提供了完整而清晰的视角。在其《共同体与社会》中,他描述了现代工业社会较之于农业文明的基本特征。在近代工业文明中,由于脱离土地的束缚,传统对人们不再起主导作用,取而代之的是理性和利益。为了适应文明的传承和发展,文字取代“面对面社群”成为主要沟通媒介。同时,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家族关系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人们为了谋求共同利益而聚合在一起共同行动。整个社会中人们的相互关系是建立在目的、利益的基础之上。这是一种目的的联合体,是一种成员之间相互陌生、基本分离甚至充满敌意的共同体。维系社会秩序的不再是传统、礼治和长老制,而是冰冷的法律。这种社会是一种机械的人工制品,它淡化了情感,充满了冷漠,然而却与机器化大工业的发展相一致。

显然,乡土中国与城市中国之间的差异并非仅仅停留在文化上,而是文明之间的差异,是被滕尼斯称为礼俗社会和法理社会之间的差异,是古代农业文明和近代工业文明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表现在传统、情感、沟通媒介、社会网络、人际关系、道德观念、伦理观念、社会秩序等诸多方面。农民工心中的冲突并非仅仅是两种文化的冲突,而是两种文明的冲突。

### 农民工身份焦虑:新旧文明冲突的继续

农民工心中两种文明力量的较量和冲突,和鸦片战争后洋务派和守旧派之间的激烈争辩并无二致。农民工睁眼看见了他们陌生的城市 and 它所代表的一切,改革派睁眼也看见了西方近代社会和其所代表的一切。当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洋务派,从器物层面上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道光皇帝给的朱批乃是“无礼、可恶”。洋务运动失败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从制度层面提出发展民族工商业、兴办学校、实行君主立宪的改革措施,立刻遭到守旧派的强烈反对:“天不变、道亦不变”,“祖宗之法不可变”。之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发动辛亥革命,然而窃取革命果实的袁世凯不仅梦想恢复帝制,还在文化领域提出“尊孔复古”的逆流。改革派则奋起反击,胡适、李大钊等人发动了新文化运动,掀起了文化层面的改革,举起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

这种新旧文明的冲突,在当代农民工心中也在发生。

农民工刚刚进入城里,立刻感受到的是一个不同的世界。面对这个陌生的世界,他们心中首先感到自己经济的缺乏和能力的不足。他们第一个反应乃是像洋务派一样,保留心中对于故乡农业文明的认同和依恋,仅仅试图在技术、知识、语言等“器物”层面上进行改变以适应环境。残酷的现实却将这种想法化为灰烬。为了生存他们愿意更进一步,试图从“制度”上适应城市文明,接受法理社会,接受整个社会中人们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目的、利益的基础之上的现实,接受社会联合体所散发出来的人际冷漠,这种冷漠和故乡家族中的温情脉脉显然相距甚远。然而,他们内心对故乡礼俗社会的依恋往往将他们投入到挣扎之中。最后,他们或许还要适应工业文明中的法制文化、民主文化、自由文化、竞争文化,这更会和他们内心中根深蒂固的尊卑、孝悌、安分守己等农业文化和道德观念产生激烈冲突。

在这种巨大的冲突中,他们不得不选择是做一个近代文明中的城市人,还是古代文明中的农业人。他们身在城市,需要为了生存而适应城市社会,然而他们内心却深深依恋着乡村文明的整套模式。他们想要做城市人,又不想放弃农村中的传统情感和面对面社群;想要适应城市文明的人际关系,却又极度怀念家族关系中的温情;想要适应社会秩序,却又难以理解城市文明中的法制;想要适应竞争文化,却又舍不得农业文明中特有的尊卑、孝悌、安分守己等美德。他们甚至想要与城市文明彻底决裂,然而见过的世面却使他们无法忍受农业文明的贫穷和破败;他们甚至想要与农业文明彻底决裂,然而惊讶地发现自己在新文明中想要立足乃是那么的艰难。于是他们竟然掉入到了两种文明中间,哪一个都不能认同,哪一个都无以立足,哪一个也沾不上边。在无奈和迷茫之中,他们竟然不知道自己究竟是乡下人还是城里人,于是身份焦虑就会出现。

因此,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的冲突,农民工身份焦虑体现的是两种纵向文明——古代农业文明和近代工业文明之间的冲突。两个文明体都带着他们的整个力量在农民工心中作战。农民工身份认同中的巨大张力,在他们进城的那一刻,一下子就塞进了他们心里。久而久之,身份焦虑就成为他们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

### 两条道路,一个未来

从公共政策角度,国家和政府该如何面对农民工心中的身份焦虑?摆在政府面前的似乎有两条道路。第一就是在城市中构建一种具有保护性的亚文明,这种亚文明是有别于整个城市文明的农业文明,从而尽可能地减少现代文明给他们生活方式造成的冲击,以保护其固有的身份认同。这方面的公共政策可能包括:建设农民工聚集的农民工社区、同村楼、农民工俱乐部、农民工同乡会、农民工社交网站等。另外一条道路则是对农民工进行文明“进

化”，帮助他们迅速迈进现代文明，拆毁其固有的身份认同，构建基于城市文明之上的身份认同。这方面的公共政策可能包括：农民工夜校、将农民工廉租房插入现代城市小区、农民工子女均等化教育等。

显然，前一种方式能够在短期内减轻农民工身份焦虑，并且不对农民工造成适应性痛苦，然而不符合整个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趋势。后一种方式将会给农民工造成心理压力，容易导致农民工一定时期的疑虑和孤单，甚至可能遭到目标群体的抵制，然而却比较符合长远之计。虽然解决农民工身份焦虑的政策路径可能有两条，然而发展方向只能有一个：社会的发展和耕种技术的进步，必须要将他们从一个农业文明的乡下人，改造成一个个现代文明的都市人。

## 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的困境

□韩晓燕，中共上海闵行区委党校讲师

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认同是指他们在进城务工的过程中，对当地政府、相关的社会制度与政策、城市政治文化等的认同感，以及对城市社会的归属感。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认同是其维护权益，更好地实现自身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其融入城市，参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 一、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及其政治认同的现状

新生代农民工介于农民和市民之间，受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形成了该群体独特的特点和价值取向。

1.受教育程度有所提高，但仍待加强职业教育。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比起父辈们有了明显提高。绝大多数都接受过九年义务教育，相当一部分还接受过高中、中专甚至大专教育。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使得他们更注重个人的职业发展和生活品质的提高，融入城市生活的意愿也更强，这是值得肯定的地方。但必须看到的是，他们受教育程度与城里的同龄人相比还是有很大的差距，职业技能水平仍滞后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需求。随着城市产业由劳动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转化，新型产业需要具有相对高知识的产业工人，如果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和技能水平不能获得比劳动力市场需求更快的发展，将来很可能出现“结构性失业”的现象。

2.工作期待值加大。新生代农民工在职业的选择上，更加注重发展空间，更倾向于选择较体面、较安全和有发展前景的工作岗位。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在建筑、运输等工作条件差、体力劳动强度大的行业中的就业人数明显减少，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和服务行业。还有部分把打工看作

是暂时的，创业做老板才是目标。国家统计局2011年发布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结构和特点》研究报告即指出，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都有明确的职业发展目标，比较看重自己未来的发展。对于职业发展目标，有25.8%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掌握专业技术，有一技傍身”，还有26.3%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自主创业当老板”。

3.消费理念日趋城市化、现代化。不同的生活习惯决定了人们不同的消费理念。新生代农民工来到城市打拼，塑造着他们所特有的城市消费理念和习惯。首先，消费结构日益多元化。他们不再像传统农民工那样将收入只用于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除了餐饮和房租上的基本消费外，他们在娱乐、交通、购物等方面的消费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其次，消费途径更加现代化。除了现金消费外，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开始使用网上银行、网购、手机银行、刷卡消费等现代消费方式。再次，消费心理更加前卫。他们不再秉承父辈们的节俭，而且他们舍得花钱，在善待自己的同时，也在追求时尚。

4.身份认同的模糊性：在“农民”和“市民”之间游移。“农民工”本身就是一个含义模糊的概念。这种模糊状态在新生代农民工身上表现得更为显著。他们在初高中毕业后就进城打工，他们的成长经历与城市同龄人更为趋同，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对乡村的认同度并没有他们的父辈那样强烈，没有多少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经验和技能。他们渴望融入城市，并成为城里人，而在他们试图融入城市时却发现，由于现有制度的藩篱、较高的城市生活成本，使他们只能体会城市文明之“表”，无法真正转化为城市的产业工人，融入城市的压力和苦闷，让他们很容易出现“身份迷失”。

与传统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更为关注自身的经济权利、社会权利，更迫切希望能融入城市发展，能有自己的话语权和话语体系，为此，他们的政治表达和维权意识觉醒；政治参与积极性更高，政治认同的期望也更大。

1.政治认知和维权意识的觉醒，是促进政治认同的前提和基础。新生代农民工教育程度的提高、自身素质的提升以及城市工作和生活的经历，使他们容易接受城市的现代意识、价值观念和法律意识，也更容易形成对城市政治文明的认同感，同时，为了获得平等就业权、劳动和社会保障权、政治参与权、话语表达权、基本公共服务权等，他们更乐于参与城市政治活动，进行政治表达，并渴望通过参加城市政治活动维护自身权益。

2.政治参与、认同的目标由“经济型”转向“经济+政治型”。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责任感、主人翁意识逐渐增强，政治参与、认同的功利主义色彩逐渐淡化，开始积极谋求个人及本阶层的平等和受尊重的权益，对政治的关注度比传统农民工明显提高，政治参与心理正呈现出积极、主动、开放的发展趋向，参政心态正朝着民主型、公益性